

彝文概貌

彝文文献概览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古老且发展较完善的传统文字。彝文的明显表征之一，即是拥有载体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彝文文献形制

近代以来，尚遗存、流传于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帛书、岩书、瓦书、木牘、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

纸书：现存彝文文献绝大部分为纸书，纸书包括抄本与木刻印刷本两种。

抄本：彝文文献绝大部分为手抄本。大多由毕摩（参见

毕摩：彝族原始宗教祭司。



图一

彝族毕摩（彝族原始宗教祭司）



图二

彝族毕摩（彝族原始宗教祭司）

（李光天 提供）

插图照片图一、二）世代传抄流传，用纸多为土纸类竹纸和绵纸；用竹签或毛笔从左至右直书；用墨多以松明烟尘兑酒加畜胆汁配制而成。早时多用竹签书写，因首笔落墨较多笔划较粗，随之墨少笔划渐次显细而字体形似头大尾细的蝌蚪，故有汉文文献称彝文为蝌蚪文。文体多为五言句，一般没有断句，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符号表示某段完结。有部分抄本是用黑墨或红黏土研制而成的红墨在纸页上划分若干纵格，再将彝文直书于格内，据说此是简束书的遗式。

有的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有单色或彩



图三 绘有彩色插图的彝文文献手抄本

色。彩色插图一般先用黑线条勾画出物体轮廓，再用黑、红、黄、白、蓝等色添色。插图有的是配合书本文字内容而绘，有的则与内容无关，仅作一种装饰而已（参见插图照片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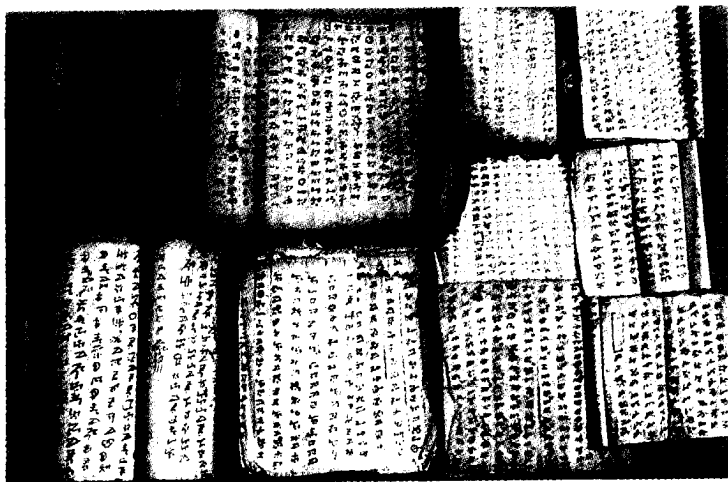
彝文文献抄本用的纸开不等，有整张、4开、8开、16开、32开以及64开袖珍本等规格。装帧形制亦是多种多样，有百多页装订成册的，也有五七页即作一册的；有宽仅十几厘米长却达数米的折装（梵夹装）册，有的装订一侧加木棍而成卷轴装册；有的一册即为一完整内容，有的一册包括若干部分内容。因此，每册字数悬殊颇大，多者十几万字，少者几十字（参见插图照片图四、五、六）。滇东南罗平县大河乡丫戈彝村毛金荣毕摩，将其所有用书分标题集抄成一册，有千多页，数百万字，重达7.5公斤，总书名为《玄通大书》，成为彝文文

献抄本之最。

彝文文献抄本的封面封底多用麻布或绵布，少部分用经过裱糊的纸格褙为之，然后再用宽于书本一倍多的布或绸缎、或牛羊皮或麂皮加于封底，展端订一小带子，使之平时便于卷包扎紧存放。装订多用麻线、棉线或丝线订成线装式，少部分则用三个棉纸捻子装订。

彝文文献抄本均无“前言”“后语”，书名则根据全文内容，不加任何修饰，简短而朴实、准确地予以命名。绝大部分不署抄者姓名和年代，年代即使偶尔有之，则一为当朝皇帝年号的汉音彝写；另一为十二属相纪年。从现存署有皇帝年号的抄本来看，仅少部分为明代，大部分则属清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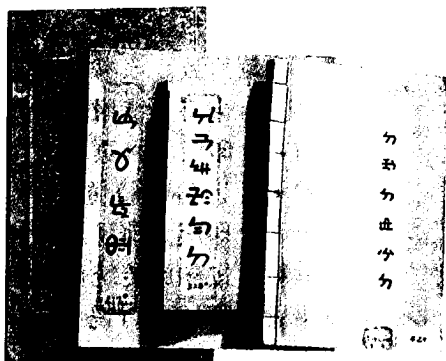
木刻印刷本：迄今发现的彝文文献木刻印刷本，有云南武定的《劝善经》（亦称《太上感应篇》）、《神威经》、《哎哺洁净经》红河的《妮节审》（即《道德经》）元江的《色尾处莫》



图四 彝文文献手抄本



图五 彝文献手抄本书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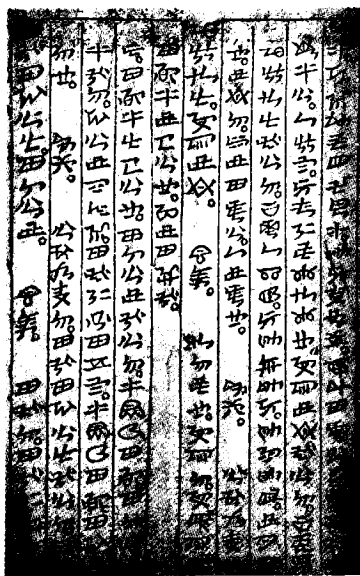


图六 经过装裱的彝文献

(意为“做人之理”)四川凉山的《玛木特依》(即《教育经典》)贵州威宁的《摩史数》(意为“孝敬父母”箴)。彝文木刻本大都由彝族土司主持刻印,这七部木刻中,除《玛木特依》可据所署刻印年代,确知系凉山彝族土司岭镇荣刻印于清光绪年间;《神威经》与《哎哺洁净经》两部合订成一册,为武定环州李氏土司刻印于属狗年外,其余四部具体刻印年代不详,但均不早于明代。

在彝文文献木刻本中,《劝善经》是字数较多,刻印较精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此刻印本系用绵纸印制,用丝线装订成蝴蝶装本,全书共五十九个印版(每版两页)118页。页码依传统从左至右编排,于版心靠左(即页面页口)刻彝文序数,

靠右(背页页口)刻对应的汉文序数,形成一个印版即一个页码编号。边栏为单线栏,有的书页刻有九条行界而为一页十行,有的书页则无行界,行数没有一定的规律,估计一书由多人分刻所致。该书为散文体,共三万余字,统用圆圈断句;前三个印版(六页)为汉文文献《太上感应篇》的翻译,后五十六个印版为前译逐句解释。解释是按彝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借题发挥地进行说教,从而宣扬忠孝、行善、因果报应等观念。翻译准确,语言生动、简练,刻字秀倩,是翻译、彝



图七 彝文文献刻印本《劝善经》书页

语文写作、彝文书法等所不可多得的典范（参见插图照片图七）。此书印行量较大，旧时武定、禄劝、元谋等县彝族毕摩几乎人手一册。据传，该书价为每本白银一两。目前，彝文文献收藏单位有多家收藏有此书，仅北京图书馆馆藏就有十六部。此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和雕刻印刷年代，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先生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彝语词汇、语法结构，作品风格，以及彝文字体等综合研究，判定其约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前后所雕刻印刷。

从目前收藏的《劝善经》印本来看，有着两种不同规格的版本。一为22厘米×14厘米（以刻本边栏为据），一为25厘米×20厘米。不同规格印本的彝文笔划粗细有别，又印纸虽同为绵纸，但质地亦有明显的差别。据此判定，《劝善经》于明正德年间由武定凤氏土司首次雕版印行，其后可能因战乱等原因雕版散佚。清初武定万德那氏土司为表明其为凤氏后裔，以及宣扬其文治，依原版内容、版式，一字不改地重雕印行过。

彝文文献纸书本多由毕摩传抄、应用和保管，为表敬惜和防蛀防潮，平时一般供放于火塘上方楼梁上或神龛中，长年烟熏火烤而显得烟渍陈旧。

皮书：即书写于畜、兽皮革上的彝文文献。在纸张普遍使用以前，来源较为广泛的畜、兽皮革，是古代彝族曾常用的书写材料。彝文古籍《裴妥梅妮·苏嫫》（意为“人祖源流”）记载：“默陆（古代彝族居住的地方）那地方，有个人叫于德（古代彝族毕摩）羊皮来写字，牛骨来做笔。”^①又彝文古籍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30辑《裴妥梅妮·苏嫫》，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论彝族诗歌·彝族史话》亦载：“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就用那皮革，鞣白来写字。各处的牛皮，各方的羊皮，他俩都收来，收来写诗文。天下的诗文，这样写下的。那牛羊皮，皮上有诗文，皮上有字句，皮上有鸟形，皮上有人形，人间万物形，万物形俱备。”^①据贵州省威宁县民委同志介绍，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法国军人，曾于1872年从威宁彝村弄走了一份书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抄件，该皮书还用红颜色勾画人物图案作为边饰。目前，贵州毕节彝文翻译组收藏有皮书彝文古籍。

布帛书：即用布、帛作为书写材料的彝文文献。前引《论彝族诗歌·彝族史话》又记载：举奢哲和阿买妮“他们二人呀，白绸来写字，白绸写了字，花花绿绿的，真是美丽呀”。说明在纸张普遍运用以前，布、帛也是古代彝族经常用作书写的材料之一。目前，帛书彝文古籍似乎已绝迹，但布书则尚可见。如云南通海县里山乡一户杨姓彝族至今尚保存有一份传抄于清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以细麻布作为书写材料的“杨氏谱牒”；禄劝县皎西乡则黑村彝族毕摩李天贵生前（1995年去世）曾于一幅2米长的白布上抄录下了彝文古籍《彝族六祖史诗》重要段落。他去世后，其女儿为作纪念，用蓝丝线将此布书绣成“绣书”，并加绣了花纹围饰（此件现由云南民族学院民语系收藏）。另外，常见一些彝族住宅堂屋正梁上挂红布和堂屋门楣上挂财门布，绘有彝族八卦图的同时亦写有彝文。

岩书：此指用涂料在岩壁上书写彝文或绘画即岩画一类，非指铭刻的摩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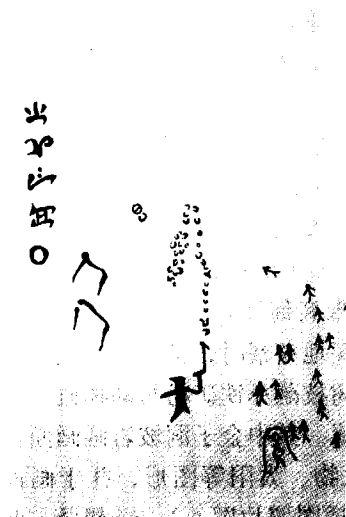
^① 王子尧翻译、康健等整理：《论彝族诗歌·彝族史话》，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根据贵州彝文古籍《颜色的由来》记载：“男的作战，女的管事，作战凯旋日，打牛打马，杀猪宰羊，如此之后，大岩上作画，黑石画骨架，牛血和马血，猪血和羊血，用来染肌肉。”^①说明彝族先民在“男的作战，女的管事”时代，即有用畜血在岩壁上作画的习俗。另据云南红河州民族研究所师有福同志等撰《弥勒原始岩画的发现及其内涵》^②一文载，在云南红河州境南盘江东侧海拔 1800 多米的高山悬崖之间，1982 年发现金子洞坡岩画，1983 年发现高甸红岩岩画。1994 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对上述两处岩画作实地考察时，又发现老虎山岩画。三处岩画画迹均系用手指或树枝蘸赤铁矿粉与动物血、植物汁等调配成紫红色颜料绘制而成。其中金子洞坡岩画画面长 10 米高 3 米，绘有古朴粗糙的人物、太阳等图形，并于画面左上角书有五个彝文大字（参见插图照片图八）。经翻译，此五个彝文汉意直译为“天祐三岩度”，意译为“天祐我部逃难三岩得生存”；老虎山岩画则是在岩石洞穴内，画面以人物、动物、供品等以及十四个彝文组合成整体（参见插图照片图九），彝文意译为“觅食求生洞穴居地摆献生神至上”。根据与云南沧源、广西右江等岩画的构图、颜料、风格、手法、内容等进行比较，研究者认为弥勒岩画更为原始、朴拙，推断作画时间距今约在 3000 年以上，甚至更早。

岩书、画因大多暴露于风雨之中而难以长久保留，其继承形式则为石刻即摩崖，故时代久远的彝文岩书多已难觅其遗迹。

参见陈长友、王继超等编：《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参见《红河民族研究》，1994 年第 1 期。



图八 云南省弥勒县金子洞坡岩画
(师有福 提供)



图九 云南省弥勒县老虎山岩画
(师有福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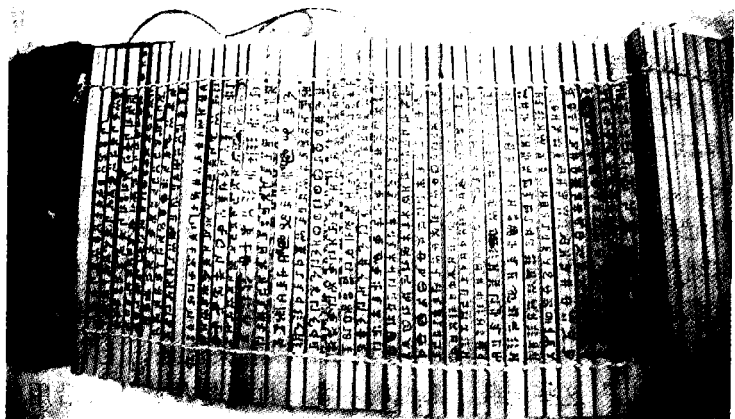
瓦书：用石灰浆在板瓦凸面书写彝文“福禄、吉祥、昌繁、寿喜、保佑”等等字，用作正屋厦檐、厢房廊檐盖瓦。此类瓦书在武定、禄劝等地彝村偶见于清末建盖的房屋。

木牍竹简：木牍、竹简同样是古代彝族采用的彝文载体之一。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彝族创世史诗）·文字、伦理》载：彝族先民尼什搓等人发明文字，将他们发明的 3000 个字，“写在竹片上，编成六本（编）书。伙伴六弟兄，每人拿一本。……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

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迹黑。”^① 又《裴妥梅妮·苏嫫》记载：古代彝族在祭奠先人时，“砍来咪西树（彝族专用做灵牌的一种树），刻上祖先名，记上生卒年。”后来在举族迁徙时：“糯氏三兄弟，离开金沙（金沙江）时，祖名居住地，刻在木头上，劈成三小块，带着离故土。”《西南彝志·德施氏源流》也记载：“慕俄格（贵州水西古罗甸国）这一家，大握其权柄，木刻与竹简 积累如柴堆。”^② 《临安府志》卷七《附夷俗》也有载：“木刻……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彝字于上，要誓于神，故不叛。……又按：唐徐虔使南诏，以木夹遣还，上有夷字，其遗制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木牍、竹简是彝族从古沿用的彝文书写载体材料之一。目前尚能见到的木牍形制，一为灵牌，云南弥勒县一带及贵州大方县一带彝族多在木牌上用彝文书写亡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作为灵牌供奉；二为咒语牌，四川凉山彝族在举行驱鬼祭祀时，多在木牌上一面画鬼像，背面书写彝族咒语。至于竹简，笔者于 1985 年曾得悉云南宣威有一彝族毕摩珍藏有一批彝文竹简，可惜未得前往实地考察，却闻该毕摩所居村寨失火，彝文竹简连其他抄本尽遭火焚。过了数年，笔者有幸见到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彝族毕摩吉木阿罗保存的一批祖传骨刻彝文和彝文竹简（参见插图照片图十）。1988 年，笔者在武定县作彝文古籍普查时，在该县万德乡马德坪村一毕摩家里见到一副用于占卜抽签的陈旧竹简。称其为“竹简”，是因其不同于汉族地区寺庙中常见的摇筒抽签，它一面

李八一昆、白祖文等翻译，孔昀等整理：《尼苏夺节》，“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五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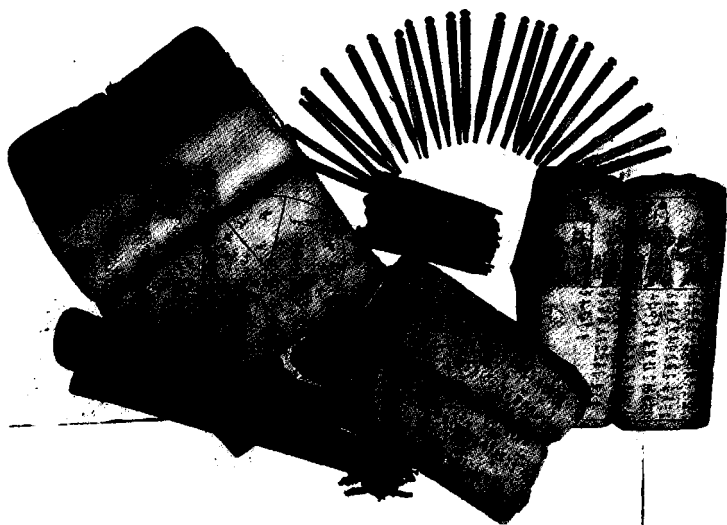
②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西南彝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 3 月第 1 版。



图十 彝文竹简

写有彝文序号，另一面则用更小的字体写对应的彝文解语概要（参见插图照片图十一）。

木刻：彝文木刻一为前述的彝文文献木刻印本的雕版。目前所见的此种雕版，有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劝善经》印本雕版，以及云南元江县洼洼乡邑慈悲村农民何长安珍藏的《色尾处莫》印本雕版。《色尾处莫》印本雕版原有四十块，现存二十五块。每块长 18 厘米，宽 26 厘米，正反两面均雕刻，每面分两页。现存部分共一百页，总计刻有彝文 1500 余字。另一种是有些毕摩和彝族富户家里雕刻于正房板壁上，内容为虔敬祖先神灵、孝敬父母、勤俭持家、和睦里邻等的彝文警句。再一种是雕刻于书案或书箱上的彝文，如禄劝县民委征集收藏有一个精工制作的彝文专用木刻书箱，长 38 厘米，宽 26 厘米，高 28 厘米。书箱正面及两个侧面均有阳刻彝文和图案。正面为一副对联，意译为“知识神哺育，才智神守护”；左侧图案



图十一 彝文文献占卜经与彝文卜签

为一白鹤傲立于蓝天白云下而远眺波涛滚滚的大海，旁边彝文题词意译为“知天白鹤”；右侧图案则为一雄鹰伫立于苍劲古木枝头云端间，彝文题词意译为“通天黑鹰”。用生动简练的两幅图及对仗工整、语言精炼的一副对联，两句题词就把彝族将知识与神灵齐观而敬重的虔诚心理，以及彝族崇拜鹰、鹤、雁而在民族学、民俗学里具有深层次的意义生动地表达了出来。

金石铭文：即铭刻于金石上的彝文文献。其中金属铭文主要是铜器铭文，目前所见时代较早的有现为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博物馆借展的“西汉铜擂钵”。此擂钵于1972年由贵州省赫章县珠市彝族乡彭家院村农民彭明忠在垦荒时，从一块青石板下发现挖出。擂钵质为黄铜，通高10.2厘米，口径5.3厘米，

重 0.8 公斤。钵身除铸有凸形蝴蝶、鸟、蟾蜍、蛇等图外，还铸有 5 个凸形彝文，经翻译意为“永传祖祠手碓(搗钵)”。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和贵州省博物馆有关专家鉴定，该搗钵属西汉时期所铸（参见插图照片图十二）。另是现为云南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收藏，原出土于弥勒县的汉代“一字格青铜剑”。该剑剑刃根部中心，两面均有一个彝文“虎”字。^① 再是现为贵州大方县奢香博物馆收藏的贵州罗甸水西铜钟最具代表性。此铜钟体高 135 厘米，口径 110 厘米，厚 1 厘米，重约 300 公斤。钟面铸有彝汉文合璧铭文，因汉文注明该钟铸于明成化二十年（公元 1485 年）



图十二 贵州省赫章县出土，铸有彝文的铜搗钵。其右侧五字即是铸于钵体的彝文。

（龙正清 提供）

而被称为“成化铜钟”。上有彝文共 230 字，主要表述了水西彝族安氏土司建祠铸钟，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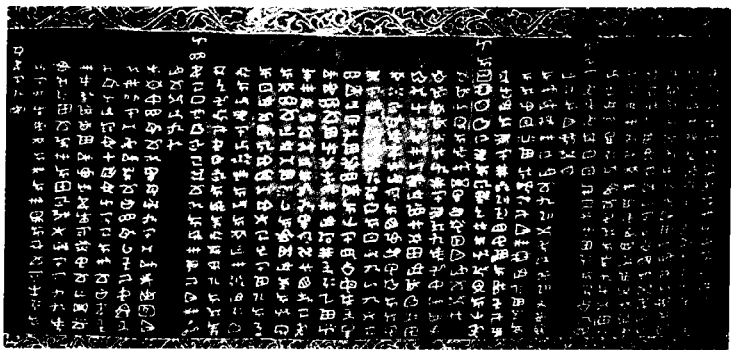
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区都有发现。滇、黔两省彝区彝文石刻大都可推算或署有镌刻年代，而四川凉山一带的彝文石刻多不署镌刻年代，一般字数较少且刻工较粗糙。就目前尚存的石刻彝文文献来看，可分为摩崖、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类型。



图十三 四川省叙永县天台山彝文摩崖
(宋永强 提供)

摩崖：目前尚可见的彝文摩崖，字体最大而较醒目者要数四川省叙永县天台山“三字摩崖”，此摩崖在叙永县后山镇天台山村境。在天台山南向刀削斧劈般的悬壁上，离地面 4 米多高处，开辟了一高 7.7 米、宽 3.1 米的凹壁，上阳刻字径高、宽均 1 米多的三个彝文大字。此三字直译为“天根台（基）”，意译则为“通天台”或“天梯”。根据当地传说和地方史实研究，该摩崖镌刻于元朝末期（参见插图照片图十三）。

除此之外，其他彝文摩崖多是彝族土司自颂历代兴隆之事。如著名的云南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刻石面长 178 厘米宽 70 厘米，彝文从左至右直书，四个段落 32 行共 563 字（参见插图照片图十四）。记述了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的武定罗婺部酋凤氏自其祖阿而至益振共十四代约 360 余年间（公元 1174—1531 年）的兴盛史。根据汉文方志史料进行比较研究，此摩崖当镌刻于明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又如云南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桃源峡，当地又俗称“石城花园”的岩壁上，摩崖彝文 120 字，内容为武定县环州彝族李氏土司（土



图十四 云南省禄劝县镌字岩彝文摩崖

舍)自颂其家道兴隆事。旁有题于清康熙年间的八首汉文七言绝句,署名“环州主人”或“环居主人”,彝文摩崖年代亦当为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再如贵州省纳雍县治昆区坡其乡扯拽箐岩壁上的彝文摩崖,刻文石面高118厘米,宽62厘米,镌刻有彝文510字。记述了当地彝族卜氏,为“修路搭桥者寿长龄高,子孙延嗣”,在近邻的赞助下,于扯拽箐大河上建桥的经过。该摩崖署明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九甲申年(公元1764年)仲冬。

纪念碑:此类碑刻一般刻文面积较大,字数较多,记述了一定的史实。如现为贵州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移藏的“妥阿哲记功碑”残件,残余彝文刻文179字,记述了蜀汉建兴年间(公元223—237年),彝族酋首妥阿哲在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助征有功,受封爵禄之事。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载: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即妥阿哲)所立,上确有建兴年号”;立于贵州黄果树瀑布上游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彝族乡栏龙河畔的“栏龙桥碑记”,碑面高70厘米,宽45厘米,刻

有彝文 589 字，记述了为畅行交通，造福后代而建桥经过和集资情况。署明该石桥为南宋开庆己未年（公元 1259 年）五月三日兴工，到庚申年（景定元年，公元 1260 年）十月三日竣工；立于贵州大方县马场区白布乡洛启坡的“新修千岁衢碑记”，为彝汉文合璧的开山修道纪念碑，碑面高 176 厘米，宽 88 厘米，彝文刻于碑的左侧，共 311 字。汉文碑文署明“千岁衢”兴工于明嘉靖乙巳年（公元 1545 年）七月初二，竣工于丙午年（公元 1546 年）四月十七日，彝汉文同碑，彝文亦为彼时所刻；立于贵州大方县鸡场区和黔西县林泉区分界的大渡河北岸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是西南彝区目前存留彝文碑刻中字数最多的一块。该碑高 178 厘米，宽 73 厘米，上刻彝文 1972 字。内容为叙述彝族默部（古代彝族部落名）历史，以及兴建大渡河桥的德政。镌刻年代为明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6 年）。

彝文纪念碑一直到建国以后仍有沿用，如刻立于 1957 年的云南“路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其碑座前后侧是汉文碑序，左右侧则为对应翻译的彝文碑序，共刻有彝文一千余字。

彝文纪念碑除石刻外，亦有用生漆将彝文书于石碑上的。如云南石林县赵龙村的“农民起义纪念碑”，此碑立于清咸丰七年（公元 1857 年），用生漆书写彝文碑文，记述了滇南彝回、汉等民族于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1861 年）联合反清起义，先后攻占路南、宜良县城，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在清军残酷镇压下，起义最终失败的经过。

乡规民约碑：此类碑刻，旧时在滇、黔彝区，彝族住户较集中，人口较多的彝族村寨多有刻立。如云南武定县发窝乡大西邑村，是一个在武定县境少有的彝族住户、人口较多且集中的村寨，在村道交口，原立有一块高约 150 厘米，宽约 65 厘